

钩沉

我所知道的古琴“彩凤鸣岐”身世

王泰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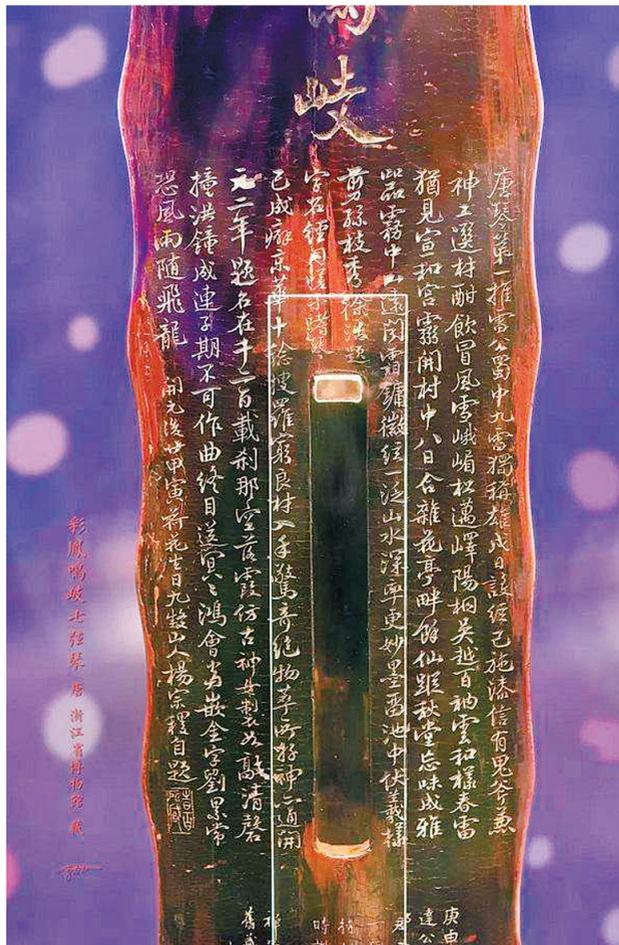
自从亮相央视《国家宝藏》之后，千工轿和“彩凤鸣岐”古琴这两件宁波宝贝，名声大振。60多年前，笔者有幸见过“彩凤鸣岐”古琴，并了解一些它的“前世”故事。

1952年，我当时任镇海文化馆馆长。有一天，下面乡政府派出十几个男劳力，用扁担把镇海江南塔峙香徐圣禅(徐桴)故居藏着的一批古琴，挑到了文化馆。我当时刚二十出头，没啥文物知识，只觉得这批古琴在县里保管不安全，就请示县长沈宏康。沈说，还是派专人把它们送到省里博物馆去吧，那里有专家。于是，就送往省里了。

据2012年第22期《看天下》中披露，这批古琴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1949年，身为第一届国大代表的徐桴去了台湾，收藏的21张古琴留在家乡，被后人捐到当地文化馆。1953年，镇海文化馆将包括‘彩凤鸣岐’在内的14张古琴移交浙江省博物馆。‘彩凤鸣岐’成为浙江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段记载是符合事实的，至于“被后人捐到当地文化馆”的说法，不准确，因为当时徐圣禅后人都不在镇海，土改结束，徐宅作为地主房屋被分了，这批古琴，被农会、农民保护下来，送到县文化馆。时间是1952年。农民挑来的古琴有14张至21张，可能是21张。

《看天下》中，那篇《彩凤鸣岐：开元盛世的琴声传来》的作者是吴久久，看来他对古琴历史很有研究。古琴制于开元盛世，制作地在西南蜀地，制作者是制琴名家雷威，琴的长、短、厚、琴音以及琴腹龙池中所刻“大唐开元二年雷威”等字样，都有考证。至于为何取名“彩凤鸣岐”，语出《国语》第一卷。古琴原为清道光时定敏亲王戴铨所收藏，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将定庆王府收藏劫掠一空。古琴流落民间，后为京师大堂支友襄办杨宗稷重金收购。杨宗稷会鼓琴，自号九嶷山人，办有九嶷琴社，著有《琴学丛书》。1932年，杨宗稷去世，在学生介绍下，他的一批藏琴(包括“彩凤鸣岐”)被售予浙江镇海曾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的徐桴，徐桴把这批古琴运回镇海江南塔峙香徐故居，一直保存完好。2008年，浙江省博物馆请了香港琴弦专家黄树志依古制安上琴弦，还请了古琴演奏家公亮弹奏。这张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古琴终于奏响，悠悠不绝。



▲古琴“彩凤鸣岐”(局部)。

▼1862年太平天国主将黄呈忠、范汝增给英法驻宁波水师头目的一份照会。(资料图片)



我在镇海县文化馆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件文物上缴给了省里，它是1862年驻宁波的太平天国主将黄呈忠、范汝增给英法驻宁波水师头目的一份照会。

公元1861年冬，太平军主将黄呈忠、范汝增二路合围，攻克宁波，将清朝官员和兵丁驱逐出宁波，同时对江北岸外国人居留地中英、法领事和水师加以限制，在城内(现在鼓楼旁)，建立宁波海关“天守关”。英法水师向太平天国挑衅，黄呈忠、范汝增即对水师发出照会。当时镇海有一向居民给文化馆送来了这份照会原件(见下图)。照会长45厘米，高20厘米，纸质较好，黄色，用墨笔写成，字迹清楚，一开首写“天朝九门御林”讨遣军……范黄照会。照会对象是：英、法驻宁波水师各舰总兵。照会中对英法水师提出要将东渡门太平军炮台移开，“本主将奉命去宁波”“炮台难移开”，警告英法水师“如其对我国攻击”“自当袭击”。最后是两长方形大印，一方印是“太平天国天朝九门御林开朝王宗进天义范汝增”，刻的文字为扁仿宋，“进天义”“宝天义”都是太平天国仅次于王的封号。

太平天国占领宁波后建立海关，限制英法在江北岸的特权，体现了维护民族尊严的立场。这样一份又正词严的外交照会应该是一件文物。我们请示后，也专送给了浙江博物馆。这个外交照会复印件后来多次在各种近代史著作、画册中出现。附带说一下，1862年5月10日，英、法水师6艘兵舰公然开炮攻击东渡门，这是外国侵略者对宁波的第一次武力侵犯。至于1862年9月10日，华尔率洋枪队进攻慈城受重伤死去，则是另一码事，华尔是清朝的雇佣军头目。



鉴赏与收藏

来楚生(1903—1975)，浙江萧山人，号然犀、负翁等，室名然犀室、安处楼，近代海派著名书法家、画家、篆刻家。

来楚生的艺术及其市场价值

方向前

品评书画家作品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那就是个性、格调与传统。大凡在美术史上开宗立派、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书画家，其风格特点是十分鲜明的，作品无须署名，一眼就能认出作者是谁。来楚生是现代海派画家中极具个性风格的杰出艺术家。大画家、好友唐云先生对来楚生艺术作过如此评价：“来氏书画篆刻无不精妙。而于书篆隶、正草均熟中求生，刚健婀娜；平心憨辣，气势磅礴，不可名状，允推当代杰手；画从书法得来，清新横逸；刻则运刀如笔，饶可奇致，皆不涉前规，开生面者也。”

认识来楚生，不妨从绘画、篆刻、书法三方面入手。来楚生绘画深受晚清大家吴昌硕的影响。来楚生的绘画成就主要在花鸟，偶作山水。他的花鸟继承了吴昌硕的传统，讲究笔墨功夫，同时吸收了八大及徐渭等人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的面目，其特点是熟中有生，简朴沉郁，以篆隶笔法人画，浑厚古拙，造型简略，色彩鲜艳，富有金石趣味及生活气息。来楚生平时喜作荷、蕉、蛙、鱼、猫、兔、鸟、鸭等题材，注重写生，善于提炼，惜墨如金。对于艺术的创新，他反复思考，从未停止过，他常说：“老走八大山人的路，不通；老走吴昌硕的路，也不通；总要走自己的路。”所以，来楚生最后形成了自己风格的阔笔写意花鸟画，形神俱备，内涵丰富，他和潘天寿被誉为“继吴昌硕、齐白石之后，花鸟画坛的两支大手笔”。

来楚生是一位书、画、印三绝的大家。他自谓：“金石第一，书法第二，绘画第三。”这个排名也属情理之中。1956年，北京和上海成立了两家画院，即北京中国画院和上海中国画院，两画院几乎囊括了南北重量级书画篆刻家，但是画院名额十分有限，重点吸收著名画家，篆刻和书法各有三个名额，来楚生与陈巨来、叶露园三人当时是以篆刻家的身份入上海中国画院的。

来楚生治印，源出吴让之，又宗秦汉印，师吴昌硕，但自出新意，重笔法、立写意，刀刀见笔，字字稳重，有“繁中不累，简中得势”之奇意。评论家李仲芳先生认为：“二十世纪的篆刻家，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排名，吴昌硕、黄牧甫、来楚生、齐白石……而肖形印，不说二十世纪，就是整个篆刻史，也不用排名，第一名无可置疑，来楚生。”

肖形印是印面只有图像、没有文字的一种篆刻。其起源可上溯商周时期，有铜、玉、石和陶瓷，它可分为人物、飞禽、走兽、虫鱼及其他五类。来楚生是近代肖形印复兴的关键人物。对于自己的肖形印，他曾告诉别人：“我的肖形印与别人是有些不同，要说经验，我只有两条，一曰向汉砖学习，二曰概括。”因此，观来楚生肖形印，具汉画砖的古拙质朴的气息，雄劲苍古的气韵，经其简练概括，把肖形印这门篆刻奇葩提高到炉火纯青的境界，有评论家称其肖形印“在近代印坛上绝无仅有，在中国篆刻史上也属冠绝古今，无出其右”。

来楚生的书法也极具个性。曾听别人讲过“书法是中国画的爹”，也常有人说“书画同源”，陈子庄讲得更彻底：“书法不好，画就不要看了。”可见，书法是一切中国传统艺术的基础。来楚生先生的画与印，有如此成就，得益于其高超的书法艺术。

来楚生书法，篆、隶、正、行、草物体俱全，而写得最多且成就最高的是隶书和行草书。其隶书取法《张迁》《石门》《曹全》等汉碑，中年后研习金农隶书并掺入篆意，后来又吸收了明清诸家的营养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隶书笔墨语言，如从郑谷口隶书中探索以草入隶的堂奥，从黄道周处获得书法的奇峭方劲，从汉代竹木简中汲取隶书的洒脱与变化，他还通过对篆刻的研习借鉴到许多互相融通的艺术法则，使其隶书更加高古、厚重、



来楚生书法作品。(方向前供图)

朴质并富含金石味、书卷气。值得一提的是，来楚生的隶书在取法上，与一般书家有所不同。二十世纪上半叶，在碑学书法大行其道之时，不少书家以碑学的视角表现隶书的法度与风规，而来楚生不但从碑中汲取隶书的笔墨技法，还从帖学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韵味，既人之碑意，又出之帖味，碑帖相济，注重隶书的气息畅达和线条的润美，有别于汉隶，又不同于明清各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来隶”。

来楚生的行草书，较多地得益于黄道周、倪元璐等明清诸家，但他在取法上并没有局限于一二家，而是上及二王、颜米，直至秦汉篆隶。所以从他的行草书中，我们得到各家的影子，又有别于历代各家。来楚生的行草与其隶书一样，糅合与浓缩了碑与帖的韵味与法度，其可贵之处是博取传统而不被传统所困，形成了醇厚、质朴、圆畅、流美的书风，成为近代书坛杰出的代表之一。

来楚生曾为自己刻过一方印曰：“闷葫芦主”，因为其不善交际，也不会宣传和经营自己，而且性格耿直，低调默口，再加上他的艺术风格拙朴浑厚，与当时市场所崇尚的秀美灵动的审美趣味格格不入，在当时，来楚生的字画篆刻市场行情并不好。来楚生入画院后有了微薄的工资收入，但生活还是过得比较清苦。

在如今蒸蒸日上的艺术市场中，来楚生的艺术价值还未被充分认识和发掘。自然，来楚生的艺术也有局限性，其一生绘画作品以小品为主(其笔墨特点也适宜作小品)，很少见其大幅作品，某个程度上，“以尺论价”影响了其作品在市场上的价值表现，甚至制约了“炒作”的动力。另外，其绘画大多以花鸟画为主，很少有山水、人物画，也几乎未曾见其有工笔绘画作品。这些局限制约了来楚生作品的市场表现，在近现代书画家中，只能名列二三线板块。从近年来的市场看，来楚生作品没有重量级的精品出现，且尺幅较小，影响了其作品价值的上扬空间，如2012年西泠拍卖，来楚生《诸体书毛主席诗词》二十二册页，估价20—30万元，最终以28.75万元成交。2014年西泠拍卖花鸟画《眉寿图》，94.5×43cm，估价4—6万元，14.95万元收槌。2016年嘉德拍卖，来楚生1972年作成扇《双鱼·篆书》，估价8—12万元，以14.95万元成交，此扇出版于《来楚生法书集》(1984年版)及《荣宝斋画谱(108)》(1995年版)。同年，嘉德拍卖1971年作，隶书五言对联“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72×11.5cm×2，估价12—22万元，最后落槌18.4万元。尽管这样，来楚生作品的仍有很大的市场上升空间。

让国宝故事飞入寻常百姓家

清宸

电视上介绍文物、古器的节目其实挺多的，但多为纪录片，呈现形式也稍显枯燥，所以在观众中没什么影响力。央视综艺频道推出的大型文博类节目《国家宝藏》能够在短时间内成为荧屏热点，自有其原因。

九大博物馆，二十七件镇馆之宝，通过影视名人演绎和文物名家讲解，共同展现国宝的前世今生，实现“让国宝‘活’起来”的题旨。官方对该节目概括为：以历史文化的内核，综艺的外壳，纪录的形式，创造一种集演播室综艺、纪录片、舞台戏剧、真人秀等多种综艺形态于一体的“纪录式综艺”节目。的确，呈现模式的“大杂烩”在客观上吸引了更广泛年龄段的观众。不过《国家宝藏》引人入胜的关键还是国宝本身的价值及节目制作方的那份诚意。

和《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见字如面》等文化类节目一样，《国家宝藏》因注重节目内容、品质，拓展了介绍形式，完成了一次古文物的逆袭。在人们的印象中，鉴赏国宝乃是阳春白

雪之事，普通大众因为学识上的欠缺，很难真正理解文物承载的广博而精深的内涵。而《国家宝藏》将国宝从高冷的圣坛请了下来，让它们突破被囚于“博物馆器物”和“书本文字符号”的概念窠臼，变得鲜活生动，有感情也有温度。看得出，节目组为了让古文物们以一种亲切的面目走进民间，走进孩子和年轻人的视野，付出了很多努力。

首先，该节目的解说词写得简明扼要不失文采。将和文物相关的各种名称、数据、朝代、人物自然融合进其诞生流转的历史之中，并构建起紧密联系。张国立先生作为“解说员”的表现很是不俗，九位博物馆馆长亲临现场对“国之重器”的介绍也极具权威性和专业性。

自己的粉丝群体来关注这个崭新的节目，让很多青少年追星者对文物也产生了浓厚兴趣。明星效应在哪里具有积极意义，无可厚非。

再次，如果说文物的“前世传奇”因年代久远，在进行戏剧化演绎时难免存在一些情节杜撰的成分，那么国宝的“今生故事”距今不远，完全真实。在这个节目段落中，观众们有机会认识不少和所介绍的国宝密切相关的人物。可以这样说，没有他们的付出，当世之人很可能就无缘得见那些传承华夏文化的器物。比如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物大迁徙中，用生命护送刻有石鼓文(一种介于大篆到小篆转化时期的古代文字)的重达一吨左右的国宝——“乍原石鼓”南去北返的北京梁生一家人；当年发掘出“妇好鸂尊”的考古学家郑振香女士；战争岁月里用智勇保护大克鼎安然无恙的苏州名门潘祖荫之后潘达于……《国家宝藏》在将这些“文物功臣”的故事述之于众的同时，也将国宝今生故事中绵延着的精神力量展现出来，大大激发了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很多人听闻这

些故事后，由衷道出了“此生无悔入华夏”的心声。

人类诞生至今，创造了各种璀璨的文明，华夏文明一脉流传，从未断裂。这些“文物中的文物”，不仅外观美轮美奂，巧夺天工，里面还蕴藏着民族文化的基因，反映出祖先的价值观念，凝聚了无数能工巧匠的妙思和手艺。国之瑰宝之所以具有传承千百年的生命力量，是因为背后有民族精神在支撑。时至今日，它们仍然给人一种特殊的感动和力量。

《国家宝藏》这个节目成功拉近了古文物和现代人之间的距离。但细究起来它也有些许遗憾。毕竟像国家博物馆、山西博物馆等馆藏级别较高、馆藏数量较为丰富的文博单位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参加。当然，其间还包括藏宝甚多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